



修辞漫话

XIUCI MANHUA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学生文库

修 辞 漫 话

洪怀香 刘长之 汪正焜

上海教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怎样使语言表达得简洁、准确、明白、鲜明、生动、形象，这就是本书所阐述的内容。本书还告诉你怎样炼字炼句和介绍了二十一种修辞格。

中学生文库 修 辞 漫 话

洪怀香 刘长之 汪正煜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77,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7,000 本

统一书号：7150·3049 定价：0.28 元



目录

ZHONG XUE SHENG WENKU

“逸马杀犬”的笔墨官司	
——什么是修辞	1
咏梅诗的优劣	
——修辞和文章的思想内容	4
袁枚退瘦鸭	
——语言的形象性	7
宋子京为何受嘲弄	
——语言的质朴	10
废话的教训	
——语言的简洁	13
文字和音乐	
——语言的音韵节奏	16
一“字”不苟	
——字的锤炼	19
为求一字稳	
——怎样炼字	21
作家和富翁	
——积累词语	24

左右为何“助”窦皇后悲	
——词语的感情色彩	27
“翁仲”和“仲翁”的故事	
——词序的调整	30
“长短”与“整散”	
——句子的结构	33
华子良狱中接关系	
——句式的省略和倒装	37
诗人的“怪癖”	
——句子的锤炼	40
若要甜，加点盐	
——文言句式和外来句式的运用	43
初三的月芽	
——比喻	45
圆规与诸葛亮	
——借代	49
聪明的笨人	
——映衬	52
耳中“见”色，眼里“闻”声	
——通感	55
辚辚·萧萧·啾啾	
——摹状	58
一箭双雕	
——双关	60

古诗新用

——比拟	65
“风情”与“猎犬”	
——比拟	68
三声吓退十万兵	
——夸张	72
名人临终前的话	
——婉曲	76
从“阿堵”到“阿Q”	
——避讳	79
优伶的智慧	
——反语	82
狄更斯钓鱼	
——设问	86
“眼睛，眼睛，眼睛……”	
——反复	90
“云中雁”和“水上鸥”	
——对偶	93
海浪的威势	
——排比	97
“联珠”和“连环”	
——顶真	100
巧妙的“盘中诗”	
——回文	103

“京兆尹”和“且介亭”

——析字 106

“之”字文的奥妙

——同字 109

三十六“鬢”走为上计

——歌后 112

“逸马杀犬”的笔墨官司

——什么是修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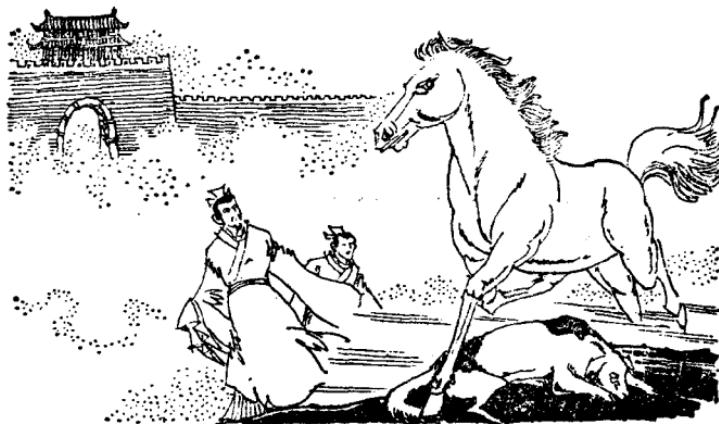
说来有趣，一场笔墨官司竟然打了近九百年，而且悬案未断，至今有人津津乐道，争论不休。

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两个文人穆修和张景一同上朝，等在东华门外，“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就各记其事。穆说：“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说：“有犬死奔马之下。”沈括很自诩，认为穆、张两个人的说法“皆拙涩”（都不平易，不流畅），自己的“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说法好。后来一个叫陈善的人在《扪虱新话》中又作评论，认为比较起来张景的说法为优，沈括的说法更“浑成”，穆修的说法最差。

若干年后，有人在《唐宋八家丛话》一书中又记载了此事，不过故事人物变了，说是北宋的欧阳修与翰林院同事出游，见“有奔马毙犬于道”，欧阳修提议“试记载这件事”。那个同事记述道：“有犬卧通衢（大道），逸马蹄而毙之。”欧阳修笑他太罗嗦，若这样写历史，一万卷也写不完。接着自己概述为：“逸马杀犬于道。”

这样，这件事就有了六种说法：

一、适有奔马践死一犬；



- 二、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 三、有犬死奔马之下；
- 四、有奔马毙犬于道；
- 五、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毙之；
- 六、逸马杀犬于道。

种种说法，优劣如何，竟成了修辞学界一个议题。这场笔墨官司难以公断，不过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同样一件事，若以不同角度去表达，选字造句都可以不同。

死犬一事，概述为“逸马杀犬”或“逸马杀犬于道”，确实十分简洁、扼要，但这样写仅仅把事情说清楚，做到使人明了。“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一说，文字上较前罗嗦，但它不但讲述了“死犬”这件事，而且形象描绘了犬的颜色，生动记述了犬死的经过（遇到狂奔的马，被踩死在马蹄下）。“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毙之”，更是具体地描写了事件的全部过程，包括起因，经过和结局：先是犬躺在大道上，然后有一马狂奔过来，一下子踩在卧犬身上，把它踩死了。动词“蹄”和使动词“毙”

与前面的“卧”，呼应得相当妙。如果我们运用一些修辞手法（例如比喻、夸张、拟人等等），这件事还可以记叙得更加生动形象。

作文，有时只要求把话说清楚，记叙有条不紊，做到“文约而事丰”，那么“逸马杀犬”这样的句式就值得仿效。有的时候，话仅仅说清楚尚不够，我们还必须以多种的艺术手段，魅人的文学情趣，优美的语言，创造出一种艺术境界，来深深地打动读者。这些，就是修辞研究的课题。修辞，就是研究语言形式的表现方法，语言手段的选择，语言技巧的运用，从而使语言更好地表达思想内容。不同的写作要求，不同的表达形式，对于语言的要求也不一样：怎样使语言表达得简洁、准确、明白、通顺，这就是所谓的消极修辞；如何使语言表达得鲜明、生动、形象，那就是积极修辞。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就是修辞学上的两大分野。

咏梅诗的优劣

——修辞和文章的思想内容

梅花，芬芳、耐寒、高洁。自古以来，人们把它和松、竹一起称为“岁寒三友”。并且写下许多赞颂它的诗歌，其中南宋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可称上品。原词写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陆游在抗金主张得不到支持、政治上屡遭排斥和打击的处境下写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借梅花的寂寞无主，零落成泥，馨香如故，形象地倾诉了自己的悲愤、苦闷，表达了孤高自许、矢志不移的思绪，艺术感染力很强。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同志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写了首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词中，毛泽东同志借梅花蔑视严寒，挺立悬崖，傲霜斗雪，报春不争春的艺术形象，热烈赞颂了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可以看出，这首词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和陆游词相似，但在格调情操和闪现的思想光辉上，胜过了前者。

为什么同是咏梅，同样注重修辞，后者却超过了前者呢？

判断任何一种修辞现象表达效果好不好，都应以内容和

形式两方面着眼。选词是否准确生动，句子是否精练优美，辞格运用是否贴切形象，都与思想内容紧密相关。刘勰主张“文质相称”，反对“为文而造情”，反对“以辞害意”，也是这个意思。而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又直接受到作者本人的立场、情操所制约，决不是靠修辞技巧能掩饰的。这二首咏梅诗，后者超过前者，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只有对客观事物正确认识，深刻了解，有了表现它的强烈愿望和满腔激情，才会情不自禁地去选取最恰当的语句，充分调动各种修辞手法，把它完美地表现出来。

晋朝有个潘岳，字安仁，写过一篇《闲居赋》，说自己“绝意乎宠荣之事”，不想作官，只求“消遥自得”，自鸣清高。其实，这个潘岳，很会巴结达官贵人，路上碰到那些老爷大人，就望尘而拜，或上前去溜须拍马。所以金代的元遗山评论潘岳的《闲居赋》道：“心画心声（写的和讲的东西）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是在嘲讽潘安仁尽说假话。

真情实感和修辞技巧是密切相关的。歌剧《刘三姐》有段唱词：“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作者由于对财主心肠的狠毒有了很深感受，十分憎恨财主，觉得用平实的说法不足以抒发这种情感，因而采用夸张手法，把主观感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强烈感染。



那么，没有真情实感怎么办？很好办，不写。宋代有个潘大临，很会写诗。一天在家中躺着，听到窗外秋风秋雨声，诗兴大发，赶忙起身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正在此时，催交赋税的差役在外面敲门，把他的诗意一下子败坏，他气得掷下纸笔。后来由于真情实感中断，他也不再续写下去。有位朋友向他索取新诗，他就把这一句奉赠。这句诗竟也成了名句流传至今。

可见，好诗好文章首先得有真感情。修辞技巧的运用必须以真情实感为基础；没有真情的技巧，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罢了。

袁枚退瘦鸭

——语言的形象性

袁枚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著名诗人，为人达观而又风趣，大半生住在南京的“随园”，过着论文赋诗的悠闲生活，交友很广。一天，有位叫陶怡云的朋友送他一只鸭子，上面还贴了张标签注明是只又嫩又肥的鸭子。其实，此鸭又老又瘦，无法烹食。家人都很生气，要把它扔掉。袁枚却笑嘻嘻地拦住，提笔写了一封退鸭信，名曰《戏答陶怡云馈鸭书》。全文如下：

“赐鸭一枚，签标‘维’字。老夫欣然，取鸭谛视（仔细地看），其衰蕙龙钟之状，乃与老夫年纪相似。

烹而食之，恐不能借西王母之金牙铁齿，俾喉中作锯木声；畜而养之，又苦无吕洞宾丹药使此鸭返老还童；为唤奈何！

若云真个‘维’也，则少年老成，与足下相似，仆（指自己）只好以宾礼相加，不敢以食物相待也。

昔公父文伯会宴露堵父，置鳖焉小，露堵父不悦，辞曰：“将待鳖长而后食之。”仆仿露堵父之意，奉璧足下（把原物还给您），将使此鸭投胎再生而后食之，何如？”

全文一百六十四字，嘻笑嘲谑，溢于言表，生动形象，妙不可言。其实，这封信的意思只要七个字便可说清：“鸭老，不可食，退回。”但这七个字的表达作用能否和一百六十四字相比呢？显然不能。请看：鸭子的形态，“衰蕙龙钟”；烧了吃要用王母娘娘的金牙铁齿嚼，咽入喉中还有锯木声；饲养，要用仙丹才可返老还童。仅此几句，人们就能形象地感受到此鸭之老之瘦，而对方居然标以“雏”字！要退回老鸭也不明说，而是引用了古人露睹父退鳌的典故，充满戏谑、调侃语调，也不伤朋友情面。可见，七个字只能准确地说清意思，却谈不上什么艺术感染力。而一百六十四字，则令人越读越会捧腹大笑，拍案叫绝。后者这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正是语言的形象描绘所产生的。

袁枚曾说过：“余尝谓：一切诗人，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所谓“字立纸上”，也就是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的意思。文章要写得好，语言必须生动形象，如果都是干巴巴地只求把意思说清楚，岂不令人味同嚼蜡？那还算什么文学作品？

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评论白乐天《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这两句诗，认为“峨眉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沈括的科学考证确实严谨：峨眉山在四川嘉州，与当年唐玄宗出行剑阁无关。不过沈括忘了这是写诗，白居易和杜甫在诗句中仅仅是运用借代、夸张的手法作形象的描绘，如果不是为了语言的形象性，那么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令人无法理解；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更是失诸罗嗦。所以沈括的评论实在有点欠妥。

为了加强语言的形象性，许多作家都十分注重运用各种修辞手段。鲁迅《阿Q正传》“从中兴到末路”一章，写阿Q从城里回来“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原稿中只写作“满把是钱”。定稿中显示出来的阿Q形象确实鲜明多了。读者从视觉上可以看到阿Q扔出了一大堆白光闪闪的银元和金黄灿灿的铜钱，从而不但知道他有钱了，而且感受到他“中兴”的气派和神气。所以未庄的人们立即会对他另眼相看，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如果仅用一个“钱”字，便不能收到这种效果。

语言形象，并不等同于在句中堆砌一些华丽的辞藻或者滥用修辞手法，有时候运用白描，抒真情，去伪饰，形象也能跃然纸上。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他和柔石间的革命友情，不是简单地以“真挚”之类的词语概括，而是具体描写了两人走在路上的情景：“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这段描写所用词句很普通，却把一老一少两位革命战友间相互关怀的深挚、细腻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读来感人肺腑。

为了增加形象性，作家用笔有时也不避其繁。这就是袁枚的一百六十四字和七个字相比，“以多多许胜少少许”的道理。写作时应该经常看看自己的语言是否有这种形态可见，令人目眩神驰的力量。

宋子京为何受嘲弄

——语言的质朴

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晚年曾说过：年轻时写文章，追求文字的色彩绚烂、气象峥嵘；年纪越大，写得熟练了，文字反而越显得朴素平易。所谓朴素平易，就是既要耐人寻味，又要明白晓畅，在修辞上讲究“深入浅出”。语言的质朴，其实不是平淡，它可以显现出一种清新、淡远的美，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正如我国现代语言大师老舍所说：“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百余万字，虽然是文人创作，却常常能通过质朴、平易的语言把环境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人物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描写雪景：“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到晚越下得紧了，……那雪越下得猛……”语句十分平常，但从雪的“卷”，到“密”，到“紧”，到“猛”，层层写来，把当时的紧迫气氛，加以渲染。怪不得鲁迅赞扬这节富有“神韵”之笔。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写吴用鼓动阮氏三兄弟一起劫取生辰纲，说到自己受晁盖之托特来相请时，“阮小二道：‘我弟兄三个，真真实实地并没半点儿假。……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